

什么是权力 (韩炳哲)

, December 7, 2025 4:01

然而，通过命令发挥作用的权力和基于自由和自证的权力，并非两种对立的模式。它们只是在表象上有所不同。提升到一个抽象的层面，它们显示出共同的结构。权力使自我在他者之中与自身同在（bei sich selbst，又译“自在”）。它创造了自我连续性(Kontinuität des Selbst)。自我在他者之中实现了他的选择。以这种方式，自我在他者之中得以延续。权力为自我提供了属于他的空间，在其中他能够与自身同在，尽管有他人在场。它使有权力者能够在他者之中返回自身。这种连续性既可以通过强制，也可以通过自由的方式得以实现，即自由的服从，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连续性最稳固。它以他者为中介。与之相反，强制的自我连续性由于缺乏中介，是脆弱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我的权力帮助它在他者之中延续，在他者之中与自身同在。如果中介被降低为零，权力就会转变为暴力。纯粹的暴力使他者陷入极端的被动和不自由之中。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失去了内在的连续性。面对一个被动之物，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因此，暴力和自由是权力标尺的两个终端。中介的强度增加会产生更多的自由，或更多的自由感觉。因此，权力的表现形式取决于其内部的中介结构。

权力是一种连续的现象。它为权力拥有者提供了一个广阔自我空间。这种权力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彻底的权力丧失被体验为绝对的空间丧失。有权力者的躯干仿佛充溢了整个世界，如今收缩成一具可怜的肉身。国王不仅拥有一个自然的身体，即凡人之躯，他还拥有一个政治神学的身体，与他的王国同在。当他失去权力时，便被抛回这具渺小的、凡人的身躯。因此，权力的丧失被体验为一种死亡。

权力是一种连续的现象。它为权力拥有者提供了一个广阔自我空间。这种权力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彻底的权力丧失被体验为绝对的空间丧失。有权力者的躯干仿佛充溢了整个世界，如今收缩成一具可怜的肉身。国王不仅拥有一个自然的身体，即凡人之躯，他还拥有一个政治神学的身体，与他的王国同在。当他失去权力时，便被抛回这具渺小的、凡人的身躯。^①因此，权力的丧失被体验为一种死亡。

认为权力只有抑制或破坏作用，这是一种错误观念。作为一种交往媒介，权力确保交流在某个方向上畅通无阻地流动。受权力制约者被引导（并非一定被胁迫）接受决定，即接受掌权者的行动选择。权力是一个机会(Chance)，以“提高不太可能的选项组合的发生概率”^②。通过消除有权力者和受权力支配者之间在行动选择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权力操纵或引导交往向某个方向发展。因此，它完成了“将行动组合从一个抉择点转移到另一个”，以便“限制人类行动可能性的不确定的复杂性”^③。权力引导交往的方式不一定是压制性的。权力并非建立在压制之上。相反，作为一种交往媒介，它是建构性的。因此，卢曼将权力定义为一种催化剂。催化剂加速事件的发生或影响某些过程的走向，而不改变其自身。通过这种方式，它创造了一种时间收益。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也是生产力。

卢曼将权力限制为一种交往的状况，在其中，受权力制约者那可能的否定仿佛悬在空中。当采纳一种行动选择是不可能的，即当交往出现瓶颈时，产生了对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的需求。^④权力应当把否定转化为肯定，尽管否定的机会永远存在。与那种总是说“不”的否定性权力概念相比，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的功能在于，它增加了“是”的可能性。受权力支配者的肯定不一定是欢呼雀跃的，但也并非一定是胁迫的结果。权力作为可能性，其肯定性或生

卢曼将权力限制为一种交往的状况，在其中，受权力制约者那可能的否定仿佛悬在空中。当采纳一种行动选择是不可能的，即当交往出现瓶颈时，产生了对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的需求。⑪ 权力应当把否定转化为肯定，尽管否定的机会永远存在。与那种总是说“不”的否定性权力概念相比，权力作为交往媒介的功能在于，它增加了“是”的可能性。受权力支配者的肯定不一定是欢呼雀跃的，但也并非一定是胁迫的结果。权力作为可能性，其肯定性或生产力延伸到了欢呼和胁迫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认为权力是破坏性的或抑制性的，这种印象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只有在中介性很差的胁迫状况下，人们才会特别注意到强加给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如果权力不以胁迫的形式出现，它就几乎不会或较少被感受为胁迫，仿佛它被淹没在同意之中一样。因此，对权力的消极判断来自一种选择性感知。

权力可能是游戏的一部分，它也可能配备了游戏元素，但它并非以游戏为基础。游戏甚至可以成为权力的对立面。除了游戏，其他一切行动都是渴望更多的欲望，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这是权力的特征：“权力本身，只有在它仍然是一种欲求更多的权力时，才是权力。一旦这种欲求被中止，权力就不再是权力了，即使它仍然掌控着被统治者。”⑫ 生命不是自我保存，而是自我主张：“生命不像达尔文认为的那样，只有自我保存的冲动，还有自我主张。自我保存的意志只依附于业已存在之物，进而使自己僵化，并在其中失去自我，对自己的本质视而不见。”⑬ 海德格尔一再回到尼采的话：“人想要什么，一个活着的有机体之中每一最小单元想要什么，那就是权力的增加。”

超越自我是权力的基本特质，但权力的主体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离开或失去自我。超越自我，这是权力的运行方式，同时也是与自我同行。自我超越和

自我。超越自我，这是权力的运行方式，同时也是与自我同行。自我超越和与自我同行的统一，扩大了自我的空间：“一切生命体都展示自我……作为自我留存和自我超越的统一。……在不失去自我的情况下，超越自我的力量越大，就越强大……”^① 生命体的强大在于，它持续地超越自我，它使自我占据了更多的空间。

魂。在一个残篇中，尼采写道：“权力的乐趣是基于千百次对于依赖、软弱无力的不快体验。如果这种体验不存在，那么快乐也就不存在了。”^② 因此，在行使权力时产生的快乐，与不自由和软弱无力的创伤性体验有关。获得权力后的愉悦感是一种自由的感觉。无力感意味着任由他人摆布，在他者中失去自我。与之相反，权力意味着在他者身上维持自身，也就是说，是一种自由状态。快乐的强度并不取决于游戏的开放性或游戏类型的多样性。相反，它可以追溯到自我连续性，它伴随着权力一起增长。

经常有人指出，权力建构具有不同的中介机制。一种缺少或没有中介的权力会发展出一个强制性结构，导致对他人的压制。这种权力接近于暴力。然而，在掌权者一边，可以引起一种自由的感觉。掌权者强制执行他的决定、他的选择，甚至违背他人的意愿。受制于权力者会按照当权者的意愿行事。权力创造了自我连续体，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一种外在的连续性，因为受权力制约者按照掌权者的意志行事，而无须内心的认同。对于统治者来说，自我连续性给他一种自由感，因为他的意志不会在他人的意志面前受挫。受制于权力者臣服于统治者，放弃了自己的他者性，尽管只是在表面上。他允许统治者的抉择施加于自己身上，尽管违背了他的个人意愿——他原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统治者在他者身上看到自己的意志。在他人身上感知到自我，这是构成权力感的根本要素。然而，这种权力形式缺乏中介，它使受权力支配者陷入一种不自由的感觉。恰恰是这种不对称的自由分配，导

回到自我，这是将权力意识的根本要素。然而，这种权力形式缺乏权力，它使受权力支配者陷入一种不自由的感觉。恰恰是这种不对称的自由分配，导致这种权力不稳定。

权力是一种能力，在他者之中与自身同在。这不是人类所独有的。黑格尔将其提升为普遍的生命原则，认为它将生者与死者区分开来：“生命体面对的是无机的自然界，它与自然界的关系体现了它的权力，它同化了自然界。这一过程的结果并不像化学反应那样是一个中性的产物，在这一结果中，原来对立双方的独立性被取消了。相反，生命体表明自己比另一方更优越，后者无法抗拒它的权力。……因此，生命体在他者身上只与自身同在。”^① 生命体的权力体现在，它没有在他者中失去自己，而是“比另一方更优越”，用自身占据他者，从而在他者中延续自身。走向他者的过程就是走向自身的过程。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有机体是“在其外部进程中与自身同在”，即在其与他者的关系中与自身同在。一个生命体如果不能在他者中与自身同在，就会因他者而灭亡，即因穿透生命体的他者在它身上产生的否定性张力而灭亡。

对黑格尔来说，权力在生命的最基本阶段就已经生效了。消化已经是一个权力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生物逐渐使他者与自身同一化。生命体把外在之物内化，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与他者的同一，即建立自我连续性。消化活动使生命体能够将外在之物转化为内在之物，也就是说，在他者身上返回自身。

颇为有趣的是，黑格尔把精神活动比喻为消化。这强调了消化和精神活动之间在权力逻辑上的相似性：“一切精神活动都不过是以不同方式将外部事物引向内部，即回到精神本身，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引导，通过将外部事物理念化或同化，它才变成精神，它才是精神。”^② 精神的基本特质是内化。它把他者、即外部事物，提升至其内部空间。这样一来，它在他者中就是在自己

化或同化，它才变成精神，它才是精神。”^①精神的基本特质是内化。它把他者，即外部事物，提升至其内部空间。这样一来，它在他者中就是在自己家中。被认识或被把握之物对于精神来说不是外在的，也不是陌生的。它们属于精神，是精神的内容：“也就是说，认识恰恰是消灭意识之外的、陌生的事物，因此是主体向自身的回归。”^②内化，即把外部事物提升到内部，把消化和理解联系在一起。黑格尔认为，饮食是对事物的“无意识的理解”^③。

在黑格尔看来，神经质地退缩到僵化的自我形象中，也指向了低下的生存权力。精神“只有通过正视否定之物，并与之共处，才能拥有权力”^④。用黑格尔的名言来说，精神获得“其真理，只有通过绝对分裂状态中寻找到自身”。他者在自我中引发否定的张力，精神的力量穿过张力创造了自我连续性。只有在缺少中介的情况下，自我才会排斥他者。因此，缺少中介或没有中介能力，将导致一种狭隘的、神经质的精神状态。

权力通过对他者的内化来建立自我连续性，这种权力可能但不一定要以暴力

乔治·巴塔耶对献祭的理解截然不同。他并不否认献祭的经济学层面。但在他看来，献祭的更深层意义在于经济计算之外。献祭代表了效用和经济的对立面。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破坏和消耗：“牺牲就是给予，但要像把煤送进烧红的火炉中那样给予。”^⑤献祭使事物重归于连续性，在这种连续性中，没有边界，没有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之间的分离。它是一种去物化(Ent-Dinglichung)和去边界化(Ent-Grenzung)的行动。事物从效用和目的的关联中解脱出来。因此，它重新获得了神秘性。这种无边界的连续性作为真正的宗教维度，还被巴塔耶称为“亲密性”或“内在性”。因此，献祭的祭司说：“我把你，我的祭品，从世界中抽离，在这个世界中你被降低，不可

司说：“我把你，我的祭品，从世界中抽离，在这个世界中你被降低，不可避免地降低到一个物的状态。在其中，你获得了一种外在于你内心天性的意义。我召唤你回到神圣世界的亲密性中，即一切存在者的深刻的内在性。”^①

权力的连续性即自我的连续性。与权力相比，宗教被束缚在对存在之无限连续性的体验中。这是一个“回归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人“与宇宙融为一体，与星星或太阳没有分别”^②。按照巴塔耶的说法，人们在面对神圣时感到的战栗，源于消除边界的暴力，这种暴力取消了差异：“因此，神圣恰恰可以与火相提并论，通过消耗木材而摧毁它们。如同不受限制的火焰，它是事物的对立面，它扩散，发出光和热，它激发兴奋和眩晕，被引起兴奋和眩晕的人瞬间反过来制造兴奋和眩晕。”^③

巴塔耶一再援引，对存在作为不可分之整体的经验，是一种狂欢和回归。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宗教哲学构想从动物性开始。据他说，动物已经生活在一个存在连续体中。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水在水中一样”^④。出于这个原因，它们不需要宗教。它们已经一直位于存在连续体中，欢呼雀跃。^⑤ 在

当一个集体(Kollektiv)决定共同行动时，一个公共的自我就形成了，它渴望自身，对自身充满决断。这种主体性，这种对自身的决断，在一个人对抗集体的时刻变得尤为明显。集体的权力不是基于这一次对抗。但是，当一次对抗否定地触及整体时，便展现出它对自身的决断，即它的自我，这一自我是每个权力结构所固有的，不仅存在于个人统治者中，也存在于集体中。在坚决对抗的情况下，如同在例外情况下一样，会发生权力向自身的收缩，以便保存自身。自我决断是以自我意志为基础的。没有这种自我意志，就不能产生权力结构。每一种权力形式的基础，都至少需要一种最低限度的主体性，

生权力结构。每一种权力形式的基础，都至少需要一种最低限度的主体性，不断自我重复。它首先将存在空间转变为权力空间。